

紅樓夢研究集刊

第六輯

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九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红楼梦研究集刊

第九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由学者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句容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4.8 字数356,0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

统一书号：10186·351 定价：(六)1.40元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

委 员：	邓绍基	刘世德	陈毓黑
	沈玉成	吴新雷	陆树仑
	周绍良	胡经之	徐恭时
	聂石樵	郭豫适	章培恒
	蒋和森	傅继馥	魏同贤
顾 问：	孙楷第	吴世昌	吴组缃
	吴晓铃	范 宁	俞平伯
	钱锺书		
常务委员：	邓绍基	刘世德	陈毓黑
	周绍良	蒋和森	(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 邓绍基
副主编： 陈毓黑 刘世德

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刊名题字： 钱锺书

封面设计： 曹辛之

目 次

《红楼梦》札记	张天翼(1)
红学·人学·美学	
——试论曹雪芹的“人学”思想与审美意识	程 鹏(31)
用艺术的方式把握社会历史的客观行程	
——读《红楼梦》笔记之一	王一纲(61)
<u>凤姐形象漫议</u> <u>已有八回过</u>	林文山(87)
《红楼梦》与《一层楼》《泣红亭》	
——思想倾向之比较研究	扎拉嘎(113)
对《《红楼梦》与十八世纪欧洲文学》 一文的几点看法	李之鼎(143)
论《红楼梦》后四十回	
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情节的逻辑背离	石昌渝(173)
从《红楼梦》的前八十回看续书中的林黛玉之死	韩文志(207)
卅回残梦探遗篇	
——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后原稿考索之二(上)	徐恭时(229)
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	梁归智(267)
贾瑞与王熙凤	胡邦炜(279)
“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可能解”	张宇绰(291)
“警幻情榜”增删辩	
——从庚辰本的两条脂评谈起	梁左 李彤(295)

《红楼梦》与《红楼》戏	徐扶明(311)
论清代《红楼梦》戏曲	陈祖美(333)
试论《王南石写悼红轩小像》的真伪	王利器(349)
由“幽篁图”四家题诗想起的	周汝昌(357)
王冈绘“曹雪芹小像”辨伪 ——兼分析四幅乾隆时人题咏的内容	郭若愚(365)
五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	陈毓罴 刘世德(391)
《红楼梦》小考(八)	陈 诏(413)
《红楼梦》琐谈	吴美藻(425)
红楼书话	汪蔚林(431)
台湾红学论著叙录	清 芬(441)
写出胸中魂魄时	三 白(30)
官车过往频	花 锦(60)
开箧犹存冰雪文	黄 叶(112)
敦敏《东皋集》外佚诗考	槐 雨(142)
粉堕百花洲	徐 徐(148)
碧纱橱	梅 尊(206)
历史学家陈寅恪谈《红楼梦》	碧 孙(227)
霸王举鼎	楚 人(266)
张问陶与《红楼梦》	秋 光(278)
改琦绘《琼楼三艳图》	玉 宇(290)
贾宝玉和“榧子”	拾 羽(294)
《红楼梦》的异名印本《警幻仙记》	情 天(348)
寿星	大 椿(356)
虾蟆更	瞻 詹(364)
“葬花图”	沁 芳(412)

目 次

拇指与猜拳	忆 苏(430)
《祭江》小考	扶 明(440)
编后记	(453)

《红楼梦》札记

张天翼

(一)

贾宝玉的模特儿是谁？写的是真人真事？是作者自己？“自传”说？这不对，乃叔（脂砚斋）说？也不对。这些害人不浅。要评论《红楼梦》人物，应当从“作者为什么和怎样写出这样一种人物来”这个角度来看，而不能把小说人物当作历史人物似的来评论。——自胡适的“自传”说出世以来，好些人上过当，竟把《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和事实当作实际发生过的东西，似乎曹雪芹只是照着真人真事一丝不苟地记载出来的——世界上那会有这样的创作！大观园在哪儿？薛家的当铺开设在什么街上？北门是不是德胜门？等等，都是由这种看法搞出来的问题。

脂砚斋说宝玉就是他自己。胡适则说宝玉是作者自传。有人说《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也许对。这是说，仅从某一点，某一个问题，一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可能有原型，有点事实做影子，做由头。看脂批，好象有点象。从所发生的故事，如恋爱——和姑表妹恋爱而不成；从和女孩子打交道等等来看，似乎是脂砚斋主人——曹雪芹的一个什么叔叔之类。可能取诸脂砚斋之流。但这一点在塑造人物上，在表现性格上只是个极次要的问题——如果拿这一点来写小说，那只要几千字就够写清楚了。这个范围比起整个作品的表现，小得无从计较，不足据此以论《红楼梦》。抓住这些小点不放，考据、研究、争论，那是想借此贬低

《红楼梦》，把作者说成也象他们似的侏儒。其实，脂砚斋的观点、思想，有哪一点和宝玉相同的？不只无一同处，而且脂砚斋之封建性，和《红楼梦》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正相对立的。

需要具体讨论一下创作的“由头”，现成的思想材料、形象材料和创作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作家，往往是从既有的思想材料和文学材料出发，他们自己总是不联系、不知道、或根本不肯承认他们是在代表什么新兴阶级的利益。分析、研究古典作品的人，就千万不能仅仅只拘泥在那些作为出发点的材料里（例如考据那些材料及其和作者的关系），正如一个作者创作来自什么由头（比如只起源于一对表兄妹恋爱不成的事）和作品整个表现（思想、情感、见解所表现于整个生活画面中者）的根本差别（有的甚至不相干）一样远。

宝玉不就是真事的记录，更不就是那种人物。胡适等人不懂得创作。创作的取型，只是往往取其某一点——甚至不是本质方面的一点，而生发开去，加以概括，重新创造。创作并非就真是其人其事。如写贾宝玉住大观园，园里全都是女孩子，只有他一个是男的，在封建宗法家庭里有这可能么？当然是想象的，虚构出来的，为了写宝玉这个人物性格的方便而设。

假如把书中任何人物及其事件都当作真人真事来看，那就有许多问题，如作者的观点、思想感情、政治态度，他对各阶级的态度、看法，从而这部作品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等等，就弄不清楚。还有，对有些人物为什么要那样写，处理成那种人物（如对赵姨娘母女）；为什么有些人物正面写，有些则避开；有些人物（如秦钟、柳湘莲等）为什么没有写透甚至没有写出什么名堂来，等等——这些关于作品思想内容的重要问题，就无法分析，批评，弄清楚。

当作真人真事去钻，去考，这是胡适派“红学”勾当，叫人避开、不看作品的真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另外，丢掉或歪曲掉作品中的主要东西——思想内容，而去钻

次要的、非本质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如一些个别（脱离了内部联系的）事件和情节之类，也是上了“红学家”的当。

有人研究宝玉生日众人如何坐法，费很多精力、时间“研究”出来，顶多不过说明作者在这方面也一丝不苟，一定是预先画了图表的。其实每个细心一点的作家也都会这么办，否则写下去就会不对头。把研究出来的坐次大写文章，画成图表，那仍是吃了饭没事干的“红学家”的把戏。

还有人去考、去打听大观园、薛家当铺、北门在哪里，是什么园子，什么街，什么门等等，那真是上当。许多行头，也是有真有假，如果要到医药典籍里去考“冷香丸”，那就太“天真”了。

作品中的人物是作者创造的。可能与原型人物是两种人，两种典型性格（世界观，思想情感，在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用，及其发展等等）。

甚至就按原材料来写的，也会写出不同的人物。如孙悟空、白蛇，越写越高了，质变，向对立面转化，反面人物转化为正面人物（从暴露转化为歌颂）。

也有写低了的。如《三国演义》，作者原打算歌颂诸葛亮那个封建社会里封建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却反而比正史中的人物写低了，庸俗、低级。

小说写人，要创造人物。人物的性格，指的什么？指的是人物所处的时代的阶级地位，他在阶级矛盾斗争中所形成的世界观、他的思想感情言行，及其对当时社会变动、斗争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典型人物由概括而成，这已成为作家的常识。

《红楼梦》写出封建宗法社会中的矛盾斗争，以及在这矛盾斗争中的人物——他们各有怎样的观点、思想、感情、要求、作风，等等，也就是写出了他们各有什么世界观、哲学（不管一个人是否意识到，他总有他的一套哲学）及其表现（思想、感情、言行）——这就是写出了他们的性格（不只是脾气之类）。

写人物，有选哪些方面的活来写的问题。历史书中的传，以及其他一些作品，演义，戏剧，小说，固然也写出了封建社会矛盾斗争中的人物，写了他们在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斗争中主要是在某些方面——例如政治斗争，武装斗争，或宗法伦理方面，婚姻财产等问题——的一些表现。但总没有象《红楼梦》人物写得那么具体、全面。《红楼梦》写人物所选择的方面，具体地写出了矛盾斗争中的人物性格。读了，使人感受很深。至于贾政、贾雨村怎样做官，在其它一些古代作品里对这些人有所描写，我们早就见到了。

贾宝玉，是一个概括。那么，从哪一点上来概括？概括什么特性？从恋爱？从和女孩子们打交道这一点来概括？（这是有的，有人说宝玉是“多情”、“见一个爱一个”的典型。）还是从他的思想、感情、言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系这一点上来概括？

曹雪芹还没有落后到、庸俗到流于前者。他固然写了恋爱，但那是用来表现贾宝玉这么一个人物的新性格（不受封建宗法桎梏）的。

固然，“食色性也”。但，如果不是在吃饭、婚姻上有问题，也就是说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品里就不会写面包问题，恋爱问题。说是“必须写爱情”，这是“永恒的主题”，那么吃饭、吃零嘴也是“永恒的主题”。光写恋爱本身、吃饭本身，这有什么写头！因为在那时代，那种社会，处于那么个阶级，婚姻恋爱成为问题，作者这才写恋爱。虽然这“恋爱”我们现代青年很难理解。这是历史。

《红楼梦》写了恋爱。这最好结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来读，主要学习“家庭”一章，特别是这章的结论部分。学习了这，就可以了解古代作品怎样写男女恋爱关系，和为什么要那么写。学习了这，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作品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在当时算是进步的、反封建的。

《西厢记》、《牡丹亭》写了婚姻两方的性爱而在封建时代是异端（封建时代的婚姻是被动的，没有两方的爱情的）。这是历史。在

历史上，当时有反封建意识。不是说现代。

《红楼梦》更进了一步。不只是由于体态的美丽而相悦，而且还由于有共同的反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倾向。《牡丹亭》所表现的“情”不过是其很狭很小的一条——即婚姻自主，婚姻要有爱情。宝黛之爱却比这广阔得多，涉及的矛盾多得多，因而其批判封建宗法制度也就深刻得多。这是现代恋爱的萌芽——这里所说的现代恋爱，还不是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中的恋爱。在资产阶级，在五四时期，虽然也提倡什么“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其实，资产阶级的恋爱不过是一种买卖关系。所谓“恋爱自由”等等，只是它的理想，或仅只是表面上话，而其实没实行过。小资产阶级是实行的，想按照这样子办的。但如光只解决了恋爱、婚姻问题，而不解决社会问题，还是在那个旧社会里，想要“幸福”下去，是绝不可能的。鲁迅的《幸福的家庭》、《伤逝》就写出了这个真理。

当然，《红楼梦》写的并不是现代意义的一夫一妻制。宝玉除黛玉外，还有许多奴才，可以任意把她们当作妾（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如袭人，还有其他没有明点出来的。

可是这里，也还有一点新的东西。例如宝玉对晴雯——她虽然也是个“奴才”，但这孩子“心比天高”，宝玉毕竟和她保持了纯洁的关系（不象袭人等），不强迫她，多少把她当作一个“人”，多少有点平等观念（要设想，晴雯假如在其他“主子”如贾琏、贾珍、贾蓉之流那里，这就绝不可能了）。

《红楼梦》不是恋爱故事——假如是，只要写几千字就完成了。——而是以这穿线，写四大家族（封建地主阶级代表；写了它们，就写出了整个封建阶级）。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为了谁？其实，是写新人，写资产阶级萌芽思想。

（二）

贾宝玉这一型的人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作者头脑里

固有的。创造一个典型人物的基本问题，核心，则是这人物的思想及其在当时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当时不但有新思想，还有新型人物（他不只是写书，讲学，宣传他的哲学和历史观，自然观，而且主要是有他的活动，行为，实践，怎样生活，怎样斗争）。现实中出现了新人物，作者才能从事概括、集中，才能写出宝玉这个典型；宝玉这个当时新型人物，必然有其现实基础，必然有过类似思想性格的人，而作者集中、概括、综合之。当时社会上已经有新人物（反封建统治思想、反孔孟之道的新人物）出现了，社会上有过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受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他们反对封建统治思想。这种反叛性，不只是表现于、且见之于行动。例如明朝的李卓吾等，就是新型范畴的人物。

看了关于贾宝玉的描写，使人联想到李卓吾。贾宝玉的某些怪议论就和李贽议论的某些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李贽憎“读书食禄之家”，怕“管束”。宝玉也反束缚、“禄蠹”。宝玉论忠臣，使人联想到李贽的论正直节义。“夫惟国家败亡，然后正直节义之士收其声名，以贵于后世，则何益矣！”（《藏书》二十二，《智谋名臣论》二，343）也许作者读过李卓吾的书？至少听到过？这还不能指实。但那种思想是有代表性的，是一种思潮。即使作者没有看到《藏书》、《焚书》，也会吹到那股风的。当然不是就此断定贾宝玉的原型就是李贽，还不能确指作者就是以李卓吾为原型，甚至他心目中就想的是卓吾老。当然不是说宝玉就是卓吾老。其生活形态、其表现，两者可以不相同，但就其思想、精神，其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萌芽而言，是同一范畴的。联想到卓吾老，只是说明象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早已应时代而生了；曹雪芹所生的时代，社会现实中已经有一种反抗封建宗法的知识分子存在了。他们不受封建束缚，要求获得个性自由解放，他们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用各种方式表现对封建宗法的不听话，反抗，甚至公然批评。

贾宝玉这个人物出世、成长，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他的出

走，从其时代说——必然性，从其贵族家庭说——偶然性。其次，在这贾家环境形成一个贾宝玉，又是必然性。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偶然因素。换言之，贾宝玉这种人物，在当时的社会变动中是必然会出现的。封建社会开始在解体，新东西的萌芽（资产阶级的萌芽，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观的萌芽）苗长出来了。——这是一种典型，是历史的必然性。至于这种典型写在谁的身上（贾宝玉这么一个人物，贾宝玉这么个家庭环境、遭遇等等，是偶然的）。——这是人物的个性，是偶然性。

贾宝玉在封建阶级知识分子里是个新人、怪人。这在非士大夫里是并不算什么怪，但在劳动人民中，平民中，不会是这种型的人。宝玉这新人，是封建宗法家族中的对立面。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因素。贾宝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萌芽，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萌芽的某些因素。但要注意，一是萌芽，不是成型；二是某些，不是全部。这个阶级还在封建社会的母胎里，严格地讲，它还不能算是资产阶级，只是商业资产阶级。它的成长、发展，受着当时封建社会的许多束缚，它要反束缚，要发展。贾宝玉反封建宗法的束缚，要自由发展。这是十七、十八世纪商业资产阶级要自由发展、反封建束缚在文学上的反映。

十七、十八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等都有了点苗头）的发展受到了封建制的压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正是过去一场农民大起义的记忆犹新，未来一场更高的、更新的农民革命战争到来的前夕。在这个空档里，还夹着种种矛盾。存在着农民、一般劳动人民（包括手工业者）、贫民和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存在着新兴的工商业者、商业资本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除了农民革命以外，还出现了城市手工工人和商人联合的起义运动。

封建社会开始在解体了，一个新阶级（资产阶级）正在这封建的母胎里成长、发展，要突破这个母胎，提出了自己的经济要求，政

治要求(反对封建束缚，要求自由搞工商业，要求个性解放、自由，等等)。

这些要求曾(在一定时机)表现于人民(农民、城市手工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实际行动。此外也表现于思想文化方面(如出现了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人物)。

这新的事物既在发展中，就必然要这样那样地反对封建压制。在文化思想上的矛盾斗争，就是反映了这个封建压制和资产阶级萌芽反压制的矛盾斗争。

当时产生了种种思潮。继明末之后的哲学思想斗争，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中，更夹着民族斗争。清初，朝廷拼命利用宋理学，新兴阶级则反理学，同时又同样反对和害怕农民起义。

清初把程朱理学定为官方哲学，可是还不放心，接着又倡“汉学”——到乾隆间连“理学”都不讲了，只埋头于故纸堆。哲学思想方面受压制了(戴东原还有点适应当时的新要求，把“情”、“欲”也算作“理”，但那主要是打朴学里夹带来的。他的功夫还在考字、明词、达道)，不可能象明末清初几家那样写哲学著作了。

但是，当时的新思想总是要表现出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不可能写哲学著作直接议论，发表观点，就表现于文学作品——《红楼梦》(《儒林外史》也是，不过面狭些)，曹雪芹的作品“以一大事因缘而出于世”。当时种种的矛盾斗争，必然影响到作者。不论他读过谁谁的著作没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当时的思潮，思想上的斗争，不会与他无关。

《红楼梦》创造了一个贾宝玉。这种人物从明末以来就出现过。早在以前，十六世纪(明后叶)有李贽，明清之际有王、黄、顾三家。当然，他们的反抗的彻底性不同，在当时时代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例如李贽以及与他同时的何心隐等)。贾宝玉的反抗，比起那些前人来，要微弱得多。但因为小说把这种思想感情形象地(恩格斯

曾说过，优秀的文学作品要比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著作更能表达出社会的丰富而多样的图景）加以传达和宣传，就使得不读中国古代哲学和历史的读者也能接受，因此影响很大。

前面提到，宝玉使人联想到李贽。李贽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他反对封建统治思想，反对封建压制的精神很明显，很突出。他二十六岁即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中闽乡试。三十岁时任河南任城教谕，三十四岁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旋父死守制。后任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居官三年，“厌圭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

二十余年的宦游生活，使李贽深感受管束之苦。他自叙：“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他处处与人触，他说，“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焚书》卷四《豫约》之一“感慨平生”）

李贽真是反抗封建名教、离经叛道的勇士。他反“读书食禄之家”（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反对封建社会的道学教条。

李贽的先世经营航海业，父祖皆为回教徒。他说：“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道学先生尤恶。”在任城供职时，他常游百泉安乐窝，道学家邵雍曾住在那儿。他自己说：“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焚书》卷三《卓吾论略》）因为二者正相对立。在南京供职时，耿定向假道学暴露，贽与之辩论，反映了反礼教与拥礼教的斗争。他以“异端”自居：管自己走路——“善人”“则不践迹矣”。他反对“刊定死书”。他痛击“道统”，为诸子翻案，崇墨。《藏书》翻案文字，最值得注意的是陈胜、窦建德（列入《世纪》）。还有赤眉、张鲁，介绍黄巢檄文，虽然把他们列入《妖贼传》、《盗贼

传》。他痛骂腐儒，痛斥道学，拆穿“良知”说，骂倒姚江学派。他斥儒家经书“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卷一《答耿中丞》）他认为“天下尽市道之交也”——买卖关系，用来说明孔子和弟子的关系。说尊孔者为狗，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李贽指出，人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

李贽对人之性的看法，（一）人类天然平等。人人平等，德性上平等，能力上亦平等。人人生知，人人是佛，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二）人的个性各不相同。（三）共性：人人都有自私的欲望，趋利避害，人皆相同。他说：“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凡人、圣人都有私，求私利，求富贵；“夫私者，人之心也。”人皆有富贵利达之心，“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正义、明道就是为了谋利、计功。这共性实即资产阶级性。（四）吃饭穿衣就是人伦物理。道者，即“穿衣吃饭”。认为道并不神秘，而是实际问题。而实际问题，又归之人民的生活问题。道、礼——顺乎人的物质生活、求利的本性，圣人常人同。道学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夫世之不讲道学而致荣华富贵者不少也，何必讲道学而后为富贵之资也！”道学是虚伪的。

然而“物情不齐”，“圣人且任之”。故贫富自然不平等：“天与以致富之才，又借以致富之势，异以强忍之力，赋以趋时之识，如陶朱、猗顿辈，卓王孙辈，亦天与之以富贵之资也。”才——“物情不齐”。

既然才力能识不同，天资之不同，就有贫富之区别，“强者弱之归，不归者必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众者，富者也。反映了地主兼并，尤其是商业资本大吃小的竞争。李贽在《藏书》中肯定“聚敛之臣”，他的因材思想是为有资产者剥削劳动者辩护的。